

190 长征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

长征路上的红军大学

周铁钧

我党我军历来十分重视干部培养。长征路上的红军大学在刘伯承的主持下,坚持随军流动办学,一边行军作战,一边育人铸魂。特别是在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峻关头,学校坚决反对分裂、维护红军团结,为全党全军培养了大批各级军政骨干,为长征胜利、抗战强军和革命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人才基础。



军、战事不断,红军大学始终没有中断教学。教员们利用宿营休整、战斗间隙,采取集中讲授、个别辅导、分组研讨相结合的方式露天开课。学员没有纸笔,就用木棍蘸锅底灰水,书写在缴获的旧书刊上;没有照明灯油,就点燃松脂夜读;遇到疑难问题,便在行军途中紧随教员,边走边请教。大家在学习研讨中交流思想、增长学识,既活跃了行军氛围,也驱散了征途疲惫。

红军大学每到一处驻地,教员都首先勘察周边地形地貌,结合实地情况,讲授阵地坚守、主动强攻、穿插迂回、破袭作战等战术战法,并组织现地演练,让学员在实战化环境中锤炼指挥素养、积累作战经验。

当时,有些红军大学学员自以为指挥、战斗经验丰富,尤其是高级指挥科学员都是军、师级干部,对教员的讲授有时会不以为意。刘伯承严厉批评了自以为是的学员,告诫大家一定要遵守纪律、谦虚谨慎,珍惜每一刻学习时间。在授课中,刘伯承还将旧军队“军官”的称呼改为指挥员,“士兵”改称战斗员,“传令兵”改为通信员,“伙夫”改为炊事员,“马夫”改为饲养员等,凸显人民军队的性质特点。当时红军大学创改的许多军事名词、术语一直沿用至今。

1936年3月,高级指挥科第一期学员在流动教学中完成全部课程,经考核合格后分批返回作战部队,红军大学随即启动第二期高级指挥科招生教学。

曾担任刘伯承警卫员的王泉云回忆这段历史时提到,红军大学在战斗极为频繁、条件极为艰苦的长征途中,克服重重困难,培训了大批从班、排到军、师级的革命干部。长征路上的随军办学,使学员的军事素养、政治水平和部队管理能力得到大幅提升。红军大学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边行军、边打仗、边授课、边学习,堪称史无前例。

丰富而务实的教学内容

长征路上的红军大学既没有固定校址和专用课堂,也无法按常规模式开展教学。刘伯承等校领导结合流动办学实际,确立了“教员讲课多示范,学员学习多操练”“需要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教学原则,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在行教合一、学练结合、战训一体中提升学员的政治觉悟、文化素养、指挥能力和作战本领。

红军大学教学内容主要分为政治、军事、文化三大类。

分裂风云下的红军大学

红军从初创到长征出发前夕,一直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和军政人才培养,先后创办了井冈山红军教导队、随营学校,以及信江、闽西、赣南等地红军学校、军政学校,培养了大批政治工作与军事指挥骨干。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长征前,中革军委将1933年10月17日由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分编出的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和红军特科学校合并整编为干部团,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开展教学培训。

1935年6月,长征途中的红一方面军与从川陕苏区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28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决定。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鼓动一些人向中央提出由他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后又反对北上,主张南下。7月21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同时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功绩。会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向毛儿盖集中。

8月3日,红军总部颁布《夏洮战役计划》,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为适应北上开辟新苏区、提升全军军政干部能力素质的现实需要,中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红军学校合并,在毛儿盖正式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集中开展长征途中的干部教育工作。

1935年9月,张国焘顽固坚持分裂错误、拒不执行中央北上命令,执意率左路军南下,造成红军严重分裂。原毛儿盖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建制随之解体;属于红四方面军的教职学员队伍随左路军南下;红一方面军干部团与红一军团教导营合编,改编为陕甘支队随营学校,跟随党中央继续北上。

张国焘率部南下后,于1935年10月5日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央”,并依托原毛儿盖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留存的教学力量,重新组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以下简称红军大学)。

随左路军行动的刘伯承因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反对张国焘分裂行径,遭到排挤打压,被免去红军总参谋长职务,改任红军大学校长。在极其艰苦恶劣的长征环境中,他顶住分裂势力压力,重整学校教学秩序、坚守办学育人阵地,选调张际春、曹里怀、陈伯钧等一批政治坚定、有文化、懂军事的干部担任教员,在行军作战间隙坚持办学施教,为红军保存、培育了大批忠诚可靠、能征善战的军政骨干。

战争环境中的流动大学

红军大学重组后,从各部队抽调了30余名军、师级干部,300余名团、营级干部,编成高级指挥科、上级指挥科和上级政治科3个专业科。随后,红军大学进一步扩大招生范围,由于敌军装备精良、兵力占优,红军苦战受挫、伤亡惨重,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红军大学也随大部队转移至四川省天全县红岩坝。

红军暂时摆脱敌人的追堵后,红军大学在红岩坝驻扎68天。此间,参战学员陆续返校复课,学校又从各部队增补招收学员,全校师生及勤务人员达1500余名。

在艰苦的作战环境中,红军大学坚持边战边学、边走边学。缺少教材,教员们就编写出《党的建设讲授提纲》《革命常识》《步兵教程》《夜间战斗》等教学资料,并自己动手刻板、油印;没有教具,教员们就土法自制,如在文化课中讲授昼夜、四季和日食、月食等自然现象时,就点燃油灯比作太阳,把一个大土豆穿在椭圆形的铁丝圈上,当作围绕太阳运行的地球,再用一个小土豆当作月亮,让它围绕“地球”运转。简单、具体又形象化的教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36年2月,国民党再度调集6个师的兵力向红军发起进攻,战局日趋严峻。红军大学跟随大部队撤出红岩坝,沿着草什扎河溯流而上,穿行在环境恶劣的夹金山、夹岭雪山山区,沿途时常与地方反动武装遭遇并交战。即便转战行

总结提炼实战经验。

红军进驻四川马尔康地区后,多次遭遇敌军骑兵突袭。红军虽久经沙场,但面对敌军骑兵的疾驰冲杀、四面合围,一时难以有效应对,造成不小损失。红军大学紧贴实战急需,专门开设反骑兵作战课程与专项训练。刘伯承亲自讲授反骑兵战术的阵型布设、攻防队形、突击与后撤要领,并总结出打骑兵“排枪快放”战法,撰文刊发在校刊《红炉》上。该战法迅速在全军推广应用,多次击溃敌军骑兵,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后,红军大学增设民族政策课程,宣讲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政策主张。全校师生主动向群众宣传红军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纪律规定,热心帮助当地群众修缮房屋、问诊治病、纾解生活困难,赢得了少数民族同胞的信任与拥护。

1936年3月,红军大学进驻炉霍藏族聚居区。时值初春,高原依旧寒风刺骨,许多师生缺少御寒棉衣。当地寺庙僧人主动把积存的羊毛赠予红军大学,藏族群众手把手向师生传授捻毛线、织毛衣技艺。红军大学顺势开设纺织劳作课,学员纷纷动手学习捻线编织,人人穿上自制的毛衣毛裤,缓解了高原御寒难题。

艰苦条件下创办红色校刊

长征途中,红军大学不仅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还高度重视思想宣传阵地建设,利用墙报、校刊开展政治教育、文化普及和学习交流,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学员综合素质,丰富军旅文化生活,凝聚军心士气。

1935年12月,红军大学驻扎天全县红岩坝期间,政治教员张际春、学员陈伯稚等人,在平整的外墙刷上白石灰,创办墙报《战火》,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宣传红军大学办学成果、学员学习生活风貌。课余时间,学员纷纷围看墙报、交流感悟,有的摘抄内容,有的向围观群众宣讲革命道理。

每周一期的《战火》墙报,得到了刘伯承的充分肯定,他阅后称赞:“很好!应好好帮助大家学好文化,这很重要。文化是一切学习的入门,是其他学习的一把钥匙,没有文化什么也学不成。”

刘伯承的赞许,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办报热情,也激发了学员投稿的积极性。由于墙报版面有限,张际春等人便将优质文稿精编誊抄,裱贴在两块床单大小的麻布上悬挂上墙,遇风雪天气及时摘下,天晴后再重新悬挂。版面虽得以扩大,但仍有大量优秀稿件无法刊发。

刘伯承了解情况后,召集张际春等人商议,决定在墙报基础上创办红军大学校刊,定名《红炉》,采用4开油印小报形式出刊,坚持贴近实战、贴近学员,突出红军大学特色,内容通俗易懂、接地气、有实效。

当时,红军大学刚从敌军手中缴获油印机、蜡纸、油墨等物资,为创办校刊提供了物质保障。经组稿编辑、版面设计、刻板油印,《红炉》在红岩坝正式出刊。刘伯承亲自书写刊头并题词,大意是:“我们学校是一个红炉,我们学习军事、政治、文化,以及向一切恶劣环境作斗争,克服一切困难,就要到这个红炉中来锻炼。坚强的革命意志就是在通红的炉火中锻炼出来的。”

《红炉》除转载墙报优质稿件外,还重点刊发实用战术战法经典战斗经验总结。针对红军转战川康交界崇山峻岭、峡谷丛林时多遭遇战的实际,刘伯承结合地形特点、敌我态势,撰写了《当前的隘路战斗》一文,系统阐释隘路战斗的战术原则、协同制胜方法、隐蔽通行要领以及战后阵地巩固、乘胜追击策略。

《当前的隘路战斗》在《红炉》创刊号发表后,在全军产生了广泛影响,相关战法迅速应用于长征实战,取得显著战果。随着影响力扩大,《红炉》由4开油印小报逐步改版为32开小册子,共出刊17期,印发全军学习。

对于红军大学个别学员违规违纪现象,《红炉》也开辟专栏发表批评、警示文章。如刘伯承针对某些不服从管理、嘲讽教员的行为撰写了一篇警示文章,诫勉全校师生和红军官兵遵章守纪,团结一心,争取长征的最后胜利。

《红炉》还开设文艺副刊,刊登学员创作的歌颂党和红军、礼赞革命胜利、抒写学习生活感想散文、诗歌、快板歌词、小型剧目等作品,对提升学员文字写作能力、丰富驻地文化生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长征路上,刘伯承领导下的红军大学办学一年多,先后培养了3期学员,为部队输送了大批军政骨干人才。他们中有的浴血疆场、壮烈牺牲,成为浩气长存的革命英烈;有的身经百战、屡建奇功,成长为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在革命道路上屡建新功。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中央将各方面军随军学校整合并入陕北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该校正式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校办学规模显著扩大,师资力量得到充实,为培养抗战军政干部、提升指挥员作战能力及部队管理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大批红军大学毕业学员走上党和国家、军队重要领导岗位,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接续奋斗、再谱新篇。

长征途中的舆论宣传

向 学

报刊及标语宣传

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瑞金的《红星》报,是由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中革军委机关报。为了继续发挥政治宣传功能,报社工作人员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并坚持在长征路上编辑出版。他们用扁担挑着设备,在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下坚持写稿编报。

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月,《红星》报出版了七八期;遵义会议后,报纸继续出版,直至1935年8月初停刊,长征途中先后出版“长征专号”28期。在硝烟弥漫的征途上,《红星》报没有条件铅印,就手刻蜡纸油印,每期印七八百份,发送至基层连队,其艰辛可想而知。它通过简明的新闻和通讯,及时报道鼓舞人心的红军胜利消息,广泛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歌颂红军秋毫无犯的严明军纪,颂扬红军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等英勇战斗事迹,记录长征途中艰苦卓绝的行军与战斗生活。

红一军团政治部在中央苏区创办的《战士》报,长征途中仍坚持不定期出版。该报注重宣传报道红军将士的英雄事迹,如详细报道红军强渡大渡河时17位勇士坚决勇猛、迅速渡河的动人情景;刊发舒同撰写的战地通讯《英勇顽强的“勇部”》,生动记述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的英勇战斗。

长征途中,红军结合战斗和行军实际,灵活运用文告、石刻、标语、口号等进行宣传。这些文告、石刻、标语、口号均言简意赅,对于鼓舞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士

和宣传发动群众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35年6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渡过大渡河后适用的标语口号》,将宣传标语、口号分为10大类共83条,有针对国民党中央军的,也有针对四川军阀刘文辉的,还有体现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的。宣传员或用墨、或用红漆,将标语书写在墙壁上;路旁、沟边及河边的大石上,也留有红军篆刻或书写的标语。

口头宣传

口头宣传是与听众直接交流的宣传方式。为了揭穿国民党当局对红军无中生有的诬蔑,使人民群众了解事实真相,红军每到一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以小型座谈会、大型群众会的方式,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红军的性质及宗旨,还常常在演讲前后把衣物等物资分发给群众,拉近了军民关系。

集会演讲是进行口头宣传的主要方式。长征途中,毛泽东、朱德常利用群众大会等场合宣讲党的纪律及宗旨。1935年1月12日,红军在遵义县城召开群众大会。毛泽东、朱德在大会上演讲,对遵义人民的欢迎和支持表示感谢,讲述红军是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号召人民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团结起来,与国民党及地方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当地群众。

1935年5月5日,红军占领会理通安。当天下午,红军在通安四方街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红军是劳苦大众的队伍,是为穷苦人打江山的,号召群众团结起来打

土豪劣绅,还帮助当地群众组建拥有100多人的地方武装通安贫农团,处决了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提振了人民群众的士气。党和红军的影响如春风化雨般播撒在凉山地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旧式军队不同,红军每到一地方,指战员都热心帮助群众担水、劈柴、扫院子,并借拉家常的机会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这种零距离交谈的宣传方式,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文艺宣传

红军文艺宣传活动兼具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鼓舞战士斗志、迅速传播红色薪火等多项功能。长征途中虽然充满了艰难险阻,但红军队伍文艺宣传机构相对完善,战士剧社、火线剧社是文艺宣传的重要载体。其成员有的是政治部工作人员,有的是专业文艺工作者,有的是红军志愿者,有一定的专业素养。

红军长征途经湖南宜章,广西兴安、全州、龙胜,以及贵州遵义等地时,在召开群众大会之际,借助话剧等文艺表演开展群众宣传教育,除大量散发与张贴传单、书写与涂刷标语外,还不断进行灵活的化装讲演,吸引广大群众前来听讲。

在西康地区,红军将舞蹈、话剧、活报剧、歌曲、莲花落、快板、金钱板等文艺节目呈现在广大群众面前,既满足了群众的审美需求,又起到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作用。

话剧演出与化装宣传是红军长征途中深受广大军民喜爱的文艺宣传形式,其舞台设置虽简易朴素,但宣传队的演出极富感染力,引得观众热议不绝。台下群众的目光紧紧落在化装队身上,演出结束,演员回到驻地后,仍有孩童意犹未尽地一路追随。

长征途中的各项宣传活动,宣传了群众、教育了群众。长征犹如播种机,推动了革命薪火的万里传播。

舆论宣传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舆论宣传机构是党的理论喉舌、思想阵地,对于宣传发动群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一论断生动而深刻地诠释了红军长征的宣传作用和传播革命薪火的重要功能。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十分重视舆论宣传的作用,并付诸实践大力推行,为保证长征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34年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下达的《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提出,必须在沿途开展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广泛进行口头宣传,散发、张贴宣传品,并在墙上多写标语口号。为此,红军从军团政治部到基层连队,从专门宣传机构到普通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